

目 录

繁衍四海，源远流长

——佛山市华侨历史概况……………缪化民（1）

三水县旅外华侨初探……………林 离（16）

高明县华侨概况……………罗培生（21）

中山市华侨港澳同胞对家乡建设的贡献……………黄结荣（28）

中国第一间汽机缫丝厂的创办人

——归国华侨实业家陈启沅……………谭 标（31）

简照南在家乡二三事……………陈志杰（38）

何贤先生在佛山……………刘 洁（45）

香港金融大王——胡汉辉……………缪化民整理（49）

澳门实业家马万祺……………缪化民（52）

李应林博士史略……………李宝朝（58）

韦少伯与二天油……………石 见（67）

华侨历史学家麦礼谦……………缪化民（69）

爱国华侨的楷模——冯夏威……………缪化民整理（74）

记旅美华侨——邝涸……………麦大华、吴辉川（78）

港商陆吟舫事略……………陆森昌、陈 新（82）

省港英记茶庄创始人陈星海先生……………麦大华（85）

“半是侨居半故家”

——记佛山梁氏家族之历史与现状……………黄任华（88）

江孔殷纪事……………梁世颀（101）

港澳侨胞支持抗日及解放战争的一些情况… 陈 胜（108）

战前马来亚的华侨矿工……………曾 定（112）

华工在美国所受的种种迫害……………陈 民（遗作）（121）

泰国华文文学史初探……………陈春陆（131）

繁衍四海 源远流长

——佛山市华侨历史概况

缪化民

中国人到海外定居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记载，早在公元540年，当时日本就有“秦民”（中国人）7053户。我市中山的华侨定居国外，最早的也可追溯到公元1200年以前。往后，中国人或因贫穷，或被诱骗“卖猪仔”，或因逃避战乱、政治迫害而离乡别井去“过藩”的日愈增多，出现了“有海水处就有华侨”的盛况。“华侨”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一直沿用至今。历史上把“华侨”称为“唐人”、“华人”、“北人”、“中华人”和“中国贾人”等。然而，广大华侨的历史，是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开拓创业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

美丽富饶的侨乡

佛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为珠江三角洲的心脏地带，南临南海，北靠广州，西连肇庆，东接珠海，毗邻香港、澳门。现辖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县和中山市，以及佛山城区和石湾区；面积5253平方公里，珠江流经境内注入南

海。这里多为沃壤的冲积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网交错，物产丰富，是广东省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全国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

佛山市可称人杰地灵。这里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勇敢，经过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的建设，山河增秀，百业俱兴。近几年来，佛山市坚决贯彻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坚持侨务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努力为四化建设服务。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鼎力支持下，全市经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实现了“工业大发展，农业满堂红”，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128.02亿元，比1985年增长16.5%，同1980年的40.99亿元相比，增长212%，跃居全国二十个城市产值超百亿元的行列。其中工业总产值91.45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农业总产值3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呈现出一派“城乡经济繁荣，各项事业兴盛”的新气象。

华侨遍布五大洲

佛山市是中国著名侨乡。全市现有355.23万人口，其中归侨、侨眷、港澳台同胞家属7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20%。过去许多人为生活所迫或其他原因，离乡背井，飘泊海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旅居海外华侨、华人有73万人，港澳同胞76万人，共计14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40%强。而且分布面广，遍及美国、加拿大、巴西、秘鲁、古巴、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圭亚那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公元1200年以前就有侨居国外，而在一

百多年前更有成批的乡亲远涉重洋，侨居美洲，故佛山市又有“美洲华侨的故乡”之称。

佛山市的华侨、华人大部分聚居南洋各国、美洲和大洋洲。在美国、加拿大、巴西、秘鲁的华侨、华人共159.8万人中，广东省籍占90%，以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和中山籍人最多。其中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约有6万人，75%系中山籍人。在加拿大的中山华侨约有4万人，主要聚居温哥华。大洋洲约21万人，在澳大利亚15—16万人，其中聚居在新威尔州及悉尼的，多为中山、高要、东莞籍人；在维多利亚和墨尔本（新金山）的以四邑和南海、顺德、番禺籍人为多；非洲地区华侨、华人较少，约有8万人，其中在毛里求斯3万人，南海、顺德、番禺人占30%；留尼旺2万人，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各1万人，则以南海、顺德、番禺人居多。此外，散居在东南亚各地广东籍人（泛指粤语系地区）也不少。在新加坡约占华侨、华人总数18.8%，在马来西亚约占17%，在印度尼西亚约占10%（主要聚居在邦加、勿里洞、东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等地，大部分来自中山、高要、新会和番禺）；三水县8万人，70%侨居在新加坡。在越南当局驱赶大批印支难民出境前，越南的华侨、华人约有280万人，祖籍广府地区的占50%，其中佛山各县的华侨不少，他们主要散居在以西贡（现为胡志明市）和堤岸为中心的南方各省。现据最新资料统计，在越南约有70万，柬埔寨5万，老挝1万人。

移民出洋的简史

广东濒临南海，与南洋群岛海洋相接，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海上贸易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领先。

唐朝在广州设市舶使，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已经颇为兴盛，自广州出海，可通东南亚，直至非洲东部。据史学界考证，广东人移居海外，大体是从唐朝末年或宋朝初年开始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他十二世纪初在广州的见闻：“北人（华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这些当年住“蕃”不归的华人，其中不少是从广东各地去的商人，因贸易经商滞留或其它原因在当地定居的，成了华侨的先驱者。

早期移民，主要是因通商贸易关系或避战乱渐次定居海外的。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著的《黄金牧地》中提到，他于公元943年（五代后晋天福八年）航经苏门答腊时，看见“有许多中国人耕种于此岛，而尤以巴林邦（今印度尼西亚巨港）区域为多，盖避其国中黄巢之乱而至者。”这可能是最早的记录。相传，中山石岐城郊长洲乡的开村始祖敬斋公夫妇，在宋朝时就曾侨居外国数十年。据《长洲乡音》记载：敬斋公奉使出国，回国途中，在海上遇飓风，使“楫不达中原者数十载，公进退维谷，因遍历诸国，险阻备尝，幸有香山平岚（今中山三乡平岚）携家避乱外国，公依之，以女妻，生一子，名祐；后中国信息稍通，闻宋帝昀死在新会崖门。立舟回香山，时已亦易代为元。”据上所述，中山人侨居国外，最早在公元1200年以前。三水人黄鸿魁著的《见闻杂录》中记载：三水建县前，早在宋末元初就有胥江都人出海为盗，他们到过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等地，见到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有三水县清塘人、白泥人、镇南人在此垦

植，耕菜园，有的设立咖啡寮。据此，早在公元1266——1416年间，三水县就有不少人侨居东南亚各地。在十五世纪下半期，三水县大塘邹姓有三十多人，因逃避明朝政府的追捕，结夥逃出海外而被贩运到旧金山做苦力。到清朝初期，旧金山还有邹姓的后裔。据《明史》记载，在苏门答腊岛的巨港地方，有一个名叫梁道明，南海县人，因善于经营和处置事情，深孚众望，跟随他的闽粤人达数千家之多。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以便掠夺别国资源和开发本国的资源。于是，广东沿海各地许多无地耕种的农民，以及破了产的小手工业者，被骗出洋谋生的人越来越多。珠江三角洲地区人民大批移居海外，是在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使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广大贫苦农民和城镇居民，被逼离乡背井，漂泊海外谋生。这些自由移民性质的华侨，都是亲带亲，邻串邻，由同乡牵引出去的，有部分则是由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原因而流亡国外定居的。

与此同时，欧美殖民主义者的“猪仔贸易”，在公元1850年至1875年间急剧地发展起来，他们为了掠夺殖民地资源和开发本国资源，也从中国沿海各地拐带大批“契约”华工出国“谋生”。据《古巴杂记》记载，从公元1853年到1874年间，在澳门载华工往古巴的共有260航次近11万人，大部分为香山县东、西乡的破产农民，其中被打死、迫死1.7万多人。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山移居国外的人连续不断，据不完全统计，现有30多万中山人侨居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据马来西亚霹靂州要（高要）明

(高明)会馆1975年金禧纪念特刊载文：公元1880年间，霹靂州内怡保近郊之布先、甲板、端洛、华都牙也、务边、和丰、沙叻等埠，散居要明两邑人士约有四千多人，多数以“卖猪仔”形式到这些地方作采锡矿工。公元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善于钻营的外国轮船公司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招诱中国人到美国淘金，于是一批批人登上了驶向大洋彼岸的轮船。公元1849年，300多名华人抵达加州的旧金山。以后赴美的华人不断增加，1854年，入美国境的华人达到1.6万余人。此后十年，每年抵美的华人都有几千人。这些早期到美国谋生的中国人，几乎都来自广东，其中四邑人最多，香山人居次，三邑（南海、顺德、番禺）人又次之。一般来说，四邑人多为劳工，香山人多从事技艺，经商的则多为三邑人。这种移民出洋的高潮，直至十九世纪末才逐渐有所削弱，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基本上宣告结束。

血泪斑斑的侨史

从十七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发展，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出现了国际性的人口贩卖，第一代是白奴，第二代是黑奴，第三代是黄奴，也就是从中国被迫出洋的“猪仔”。在十八世纪初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殖民地和本国资源，从中国东南沿海虏掠拐卖了大批廉价劳动力。

被拐卖出洋的人，为什么被称为“卖猪仔”？这个词可从清朝官方文件中找到。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七月廿四

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对总理衙门奏称：“十余年前（即公元1820年），适值荒年，出洋者数以千计。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者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自此称为卖猪仔。”从林则徐的奏摺中，可见“猪仔”被“卖”的悲惨。所谓“卖”，其实是在装船出洋前，被迫在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外文印制的所谓自愿出洋佣工的契约上按指画押，然后通过专门押送“猪仔”的船舶（曾有美国人形容为“浮动地狱”）输往美洲和东南亚等殖民地。

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口岸，专门设立关押华工的“猪仔馆”（也叫“巴拉抗”，意思是囚禁奴隶和罪犯的牢狱）。如公元1870年，葡萄牙殖民者盘踞的澳门，“猪仔馆”就有300多间，是监狱式的“猪仔”收容所。他们通过丧尽天良的华人猪仔头，施展各种欺诈胁迫手段，或以招工为名，以“谋生致富”为饵，诱骗出洋“谋生”，或设置赌博等圈套迫使输钱负债的人卖身出洋做苦工。在许多场合，他们竟强行绑架，如用药酒将人灌醉、用棍将人打昏了后装进麻袋劫走。那时候，每年都押着数以万计来自南海、番禺、顺德、香山、四邑等地难觅生计的“猪仔”到澳门等口岸的“猪仔馆”，搞得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稀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几乎只有妇女，没有男丁。

爱国华侨学者容闳（中国第一个留美学成的大学生），在其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中记录了当时华工被卖作“猪仔”的惨状：“当1855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鼻酸。”“当

其被人拐诱，即被禁囚室中不令出。及运奴之船至，乃驱出驱之登船。登船后即迫其签字，订作工之约，或赴古巴，或赴秘鲁。抵埠登岸后，列华工于市场，若货物之拍卖，出价高者得之。既被卖去，则当对其新主人，再签字另立一合同，订明作工年限。表面上虽曰订年限，实则此限乃永无满期。盖每届年限将满时，主人必强迫其重签新约，直欲令华工终身为其奴隶而后已。以故行时，每于中途演出可骇之惨剧。华工被诱后，既悟受人之愚，复受虐待之苦，不胜悲愤，辄于船至大洋四无涯际时，群起暴动以反抗。力即不足，宁全体投海以自尽。设或竟以人多而战胜，则尽杀败猪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一一投尸海中以泄忿。纵船中无舵之人，亦不复顾，听天由命，任其飘流。凡此可惊可怖之事，皆予所亲闻亲见者。”

华工被运到世界各地，就在凶狠的殖民主义者的皮鞭下从事奴隶式劳动。在南洋英国、荷兰殖民地开锡矿、种橡胶、开田辟荒；在美国、加拿大修铁路、淘金砂、开矿伐木；在古巴种甘蔗，在秘鲁挖鸟粪；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挖金矿、种烟等。其中，许多人被迫到秘鲁近海钦查岛上挖鸟粪，劳动条件的恶劣，令人苦不堪言。这些岛屿酷热无雨，鸟粪散发出的腐臭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华工们就是在这恶劣的条件下日以继夜地劳动着。工头规定，华工每人每天要挖掘四、五吨鸟粪，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严刑酷打。据当时的目击者记载：“很多苦力已衰弱得站不起来了，只得跪着干活，从鸟粪中往外拣小石头。沉重的手推车使他们的手掌磨得异常疼痛，只得把手推车绑在自己的肩上，来完成规定的运输任务。”由于殖民者对华工的百般虐待和折磨，造成

华工大量死亡。据史料记载，为挖掘钦查岛上的鸟粪，最初进岛华工达四千多人，但十年过后，残存的华工不过百人。在英属马来西亚，从1910—1920年的十年中，华工的死亡率平均每年为20%。中山有位幸存的老华工郑进禄，他是公元1897年被贩运到夏威夷群岛高威岛做苦力的，当时在一起上岛的有六百多名“猪仔”，过了五十三年以后，剩下只有郑进禄等九人，其余全被折磨死了。而郑进禄在1950年秋搭“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还是要由檀香山华商总会资助，身上只有16块美元也是华商总会募捐的。这就是郑进禄五十三年“猪仔”生涯最后的结果。

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反动当局，虐待、排斥和屠杀华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例如十七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菲律宾先后四次屠杀了五、六万华侨；公元1740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华侨一万名以上，有六百多处华侨住宅被付之一炬。当时的惨状，有一书是这样记载的：“凡属中华民族的人，不论穷富、老少、有罪无罪，凡是被遇到的人，都遭无情杀害。怀孕的妇女，哺乳的母亲，无邪的儿童，战栗的白须老人，都被刀剑所杀戳。河水被血染红，尸体满街，死神到处狰狞横行……”后人称为“红溪惨案”。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排华法案》；1885年加拿大政府颁发令向加华人征收人头税；1901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移民法案》（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等，都使广大华侨受歧视、被迫害，直至生命财产遭受惨重的损失。194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马来亚时期，约有20万华侨惨遭杀害。由此可见，华侨要立足当地，真是困难重重。但是，华侨先辈毕竟在逆境中站稳了脚跟，他们靠的是

中国人那种坚毅诚朴、刻苦耐劳的精神！战胜各种洪水猛兽，不断延续发展起来。

职业经济的变化

佛山市早期的出洋华工，不论到美洲、大洋洲或东南亚各国，主要是干采矿、筑路、垦荒种植的劳工。如早期到夏威夷的中山人，大部分都是从事垦荒种植的契约工人，他们除得到衣食住供给外，每月工资才三元。三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侨民，多数从事割橡胶、采锡米、建筑、开矿的重体力劳动。后来有些地区的华侨，除从事农业种植和搞建筑工外，还做手工艺匠，经营小生意的商贩等，如木匠、藤工、打金、制革、服装和茶楼业为多。到了十九世纪，经营商店、开洗衣铺和餐馆的日益增多。如香山人陈芳，1849年到檀香山经商，与同乡程直合股开设芳植记，专办中国货物到檀出售，成为一间著名的商店。后又投资糖业，开设国芬糖榨，雇用来自祖国的华工生产蔗糖，成为巨富。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871年到檀香山，在茂宜岛垦荒，逐渐积累资财，开设商店和牧场，兼营酿酒和木材，成为一个富有的农场主。香山县沙溪岗背陈滚，1887年移居檀岛，初时开肉店，后来办牧场、屠场、木器制造厂、啤酒厂、买卖地产，办起恩乔义合公司，成为二次大战前最大的华资公司。清道光初年（公元1821年），高明县明城区华侨罗谦庭东渡日本，与罗家兄弟在山下町开办“东同泰”商号，后与温姓合办“恭安泰”，商务颇活。1923年9月日本京滨大地震前，高明县在横滨关内的华侨，从万国桥到夜市街尾，经营有同乐楼、

六角亭、横滨亭、清风楼、世界楼、四海楼等饮食店，盛极一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如在印尼华侨的经商，已扩展到金属、纺织、食品、汽车、糖业等领域。三水县旅居印尼华侨黄仲威，执全印尼糖业牛耳。泰国的华侨、华人经营炼铜、炼锰、铸造和糖业等，资本已占40%。高明县旅泰华侨关元年，在泰经营多间糖厂，成为泰国的“糖王”。据资料显示：今天的美加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渗透到餐馆、旅馆、食品公司、鱼肉店、百货店、衣服店、珠宝店、中西药店、书局、印刷厂、广播电视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进出口公司、建筑公司、电气行、电脑行、汽车修理行、飞行学校等五十多个行业。自1970年以来，华侨华人在美国购置的房屋，每年平均超过二亿美元。1985年加拿大华侨华人拥有的房地产总值超过四十亿加元。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移居国外的华侨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文化水平低，缺乏专门技术，因此，工作和生活受到局限。为了让下一代在异邦能出人头地，老华侨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华侨子弟也较勤奋，故在异国土生华人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成后成为工程师、教授、医生、会计师、建筑师、科学家、高级技术人员的比比皆是。以美国为例，该国现有华侨华人知识分子已达十万人，其中三万人被认为是当今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占美国第一流人才总数的四分之一。在美国电脑研究中心，有一千多名华裔研究员，十九名部主任中有十二名是华人。

华侨社团的组织

当年华侨出洋谋生，离乡别井，寄居异邦，备受外国人的歧视、虐待和凌辱，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先侨们处在这样的逆境中，呼救无门，力求自保，只有团结一致，互相支援，共同克服困难，才能赖以在当地立足生存以至发展。加上同乡同宗，同声同气集结在一起，更需一个聚会倾谈联络的地方，故有华侨团体的组织。佛山市最早的华侨社团，有新旧金山三水同乡会，成立于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以及檀香山华侨的中山会馆，成立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

这种华侨社团组织，是一种以血缘、地缘、业缘的关系为基础，以团结互助，救灾恤贫，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兴办公益事业为目的，并根据同乡同宗喜爱故乡的文艺娱乐为活动内容，联袂乡亲，增进情谊。例如，清代至民国，香山县以“都”划分，所以夏威夷的华侨华人建立同乡会，也以“都”划分，如良都、隆都、谷都、得能都、四大都、恭常都、黄梁都等二十多个团体。

随着华侨社会的发展，这种血缘宗亲社团又发展到按祖籍县、州、府地缘性组织同乡会馆及同行职业的业缘性组织商业团体等。例如檀香山中山同乡会，日本横滨要明鹤同乡会，毛里求斯南顺会馆和新加坡三水同乡会等。近几年，在国外华人社会中，也出现了某些跨地域、跨行业的新型华人社团。总而言之，各类型华侨华人团体，在促进华侨华人团结互助，帮助华侨华人对中国的了解，发展两国之间的友

谊，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旅外乡亲的贡献

佛山市旅外侨胞、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支援家乡建设，兴办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对中国革命和进步事业，对开发和振兴民族工业，以及对家乡经济文化建设和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均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早在1873年，南海县华侨陈启沅，就从安南（今越南）回到其家乡西樵简村，创办了继昌隆缫丝厂，他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该厂产品不仅远销欧美，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据史书称，继昌隆缫丝厂创办后，“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数百家。”其中许多是华侨投资创办的。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华侨会员占了78%，而中山籍的会员则占了一半。“兴中会”的成立，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信号，以后在香港和广州等地都成立了“兴中会”。新加坡华侨邓月波（三水县人），当孙中山到新埠后，他坚决要求加入革命组织，积极资助革命。他曾回广州参加焚攻两广督署之役，然后潜回新加坡。据史学家初步统计，海外华侨在经济上支援辛亥革命约达七、八百万元。因此，孙中山曾赞誉：“华侨乃革命之母”。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旅外乡亲出钱出力，贡献尤大。

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爱国爱家，为家乡兴办各种公益事业，慷慨捐输，历久而益坚。早在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

年），爱国华侨学者容闳带头捐银五百两在家乡香山县倡办南屏乡甄贤义学（现属珠海市南屏学校）。1929年旅美华侨周崧在中山沙溪区龙头环创办周崧学校。还有岗背小学、下泽小学等十多间学校也是当时华侨捐资兴办的。中山著名侨乡沙涌、恒美、竹秀园、渡头等地宽敞的道路、学校、市场和公园，都是华侨早期捐资兴建的。越南侨商韦少伯，曾在家乡三水县独资创办“韦伯小学”，既免收学生的学费、书费，又支付教师工资和学校费用，深为乡民敬重。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是空前的，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据统计，旅居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同胞热心在家乡兴办各种公益事业，踊跃捐物、捐资总值达7.4亿多万港元。其中捐赠各种汽车8722辆，新建和扩建学校322间，医院50间，敬老院27间，幼儿园48间，侨联大厦34间，会堂23间，桥梁141座，生产资料设施933台（套），还有文化设施以及一大批生活资料等。早在1962年，港澳知名人士马万祺带头捐出巨资，在南海县西樵创办了华侨中学。香港同胞郭德胜捐资1000万港元给中山市兴建孙中山的纪念堂。旅美华侨、香港同胞杨志云捐资1000万港元，在中山市石岐兴建杨颖滨医院，并引进一批先进医疗设备。香港同胞郑裕彤、李兆基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兴建顺德县华侨中学；以后郑裕彤又牵头发动旅港乡亲捐资300万港元兴建顺德医院。香港同胞梁铨琚捐资1000多万港元，兴建顺德县梁铨琚图书馆、梁铨琚中学、北头大会堂、北头小学、杏坛区医院留医部、中山大学梁铨琚大礼堂、中大附小李秀娱图书馆等。港澳知名人士马万祺、冯景禧捐资450万港元给南海县兴建南

海中学。泰国华侨关元年捐资兴建高明县古椰小学。日本华侨谭锦基捐资300万日元给高明一中建图书馆。日本华侨梁长汉发动旅日乡亲捐资近1000万日元给高明县西安区鳌围村兴建学校、文化室、筑路等公益。香港同胞潘英利捐资200多万港元给三水县芦苞区兴办文教、卫生、交通等公益善事。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捐出巨资兴建三水县华侨中学和在佛山城区兴建元甲学校。香港同胞梁知行捐资100万港元恢复梁园，捐赠三台注塑机给塑胶厂，还捐资5万港元给儿童福利会。

许多侨胞、港澳同胞还积极回到家乡投资办厂、合资合作经营和“三来一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近几年来，佛山旅外乡亲投资办厂，搞“三来一补”共有1700多个企业，引进外资达7000多万美元。由此可见，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积极支援家乡建设，促进侨乡经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水县何时始有华侨，因资料缺乏，现还不能下结论。但据三水人黄鸿魁的《见闻杂录》手抄本记载：三水建县前，早在宋末元初就有胥江都人出海为盗，他到过马来亚、苏门塔腊、爪哇等地，见到马来亚和苏门塔腊有清塘人、白泥人、镇南人在此垦植，耕菜园，有的还设立咖啡寮。又说，有个白塔村人因犯罪逃出海外，在某埠曾经看见过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舟师。如果上述两事属实，三水县早在公元1266—1416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就有不少人侨居马来亚、苏门塔腊等地。

据了解，抗战之前三水华侨的分布情况是：芦苞人侨居新加坡（芦苞叶洲有三百多人）、马来西亚、越南等地；金本乡人多侨居加拿大、秘鲁；先觉院人多侨居巴拿马。其余新、旧金山，菲律宾，泰国等地也有三水人侨居。各地华侨的具体人数，现在还未查明。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三水侨民，在抗日战争前约有二万多人。这些侨民，妇女占百分之六七十，大部分的妇女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割橡胶，采锡米，建筑，开矿；也有的从事体力较轻的劳动，如拣松香、拣橡胶，入罐头等工作；少数男人开设洗衣店、咖啡店、服装店、理发店和从事建筑业或家庭手工业。他们同居一个埠，互相认识，互相亲善，互相扶持，而且大多数同住一条街，如新加坡的豆腐街、松柏街、牛车水等就多是三